

六盘山上想起红二十五军

刘益善



长征路上(六盘山)(国画)

带领官兵开展宣传，帮助群众打扫院落、担水、干农活。他们还抬着写有“回汉兄弟一家亲”的匾额，送到兴隆镇清真寺，并奉上六个大元宝和六只肥羊，以礼待人，同时向阿訇和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纪律，收效显著。当地回族群众和阿訇对红军不派捐、不拉夫、不打粮草的严明纪律深表拥护，阿訇还率众送来写有“仁义之师”的锦旗。

三天后的清晨，红二十五军休整完毕，未惊动群众，悄然离开单家集。

80多年后，有记者到单家集采访时，当地回族群众仍深情回忆：1935年8月，这支进入宁夏西吉县的第一支红军，充分尊重民族风俗与宗教信仰，并将当时颇为先进的粉条制作技术传授给当地百姓。如今，“红军粉”已成为当地致富产业，靠此技术，西吉县王河村摆世忠家的年收入突破三十万元，还带动同村十户人家成功脱贫。摆世忠说：“粉条对我们这个家庭和庄子来说，就是支柱产业，而这门技术正是红二十五军传下来的。”

我在六盘山上想起红二十五军，正是源于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的这段深情记忆。

历史多有缘，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必然。就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一个多月后，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也抵达此地。得益于红二十五军打下的良好群众基础，当地群众对中央红军同样热情相待，使得中央红军免去了大量宣传动员工作，得以顺利驻扎，毛主席还在单家集住了一夜。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也到达单家集，并在此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红二十五军离开单家集后，翻越六盘山，继续长征，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是最先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与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遗憾的是，政委吴焕先已在甘肃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志丹也参与了军团的领导工作。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率领下，于1935年10月7日击溃前来堵截的敌骑兵兵团后，当天翻越了六盘山。置身山巅，毛主席诗兴勃发，留下了伟大的词章《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10月19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举世震惊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六盘山，正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我在六盘山上追忆红二十五军在单家集的宣传经历与翻越六盘山的壮举，本可就此收笔。但当年写作《窑工虎将》时，我还知晓徐海东将军的另一则故事，此事在党史资料中亦有记载，值得一并写出。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严冬将至，部队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吃少穿，连温饱都难以保障。如何筹款筹备被服、让战士们顺利过冬，成为摆在中央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难题。在陕北，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会商讨对策，在瓦窑堡附近的凤凰镇专设采办处，由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成任主任。杨至成盘点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仅有一千多块大洋，而当时中央红军有七千余人，要渡过眼前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千三大洋。

杨至成将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

盛人粗瓷老碗，一勺石磨黑芝麻酱缓缓浇荡，色泽浓黑油润，全然不同于市面寻常黑芝麻酱。低温细磨的芝麻，香气沉敛绵长，膏体绵密，从不会结块黏糊。

我捧着碗筷笨拙翻拌，麻酱裹不住面条，厚重香气闷在舌尖，尝几口便搁下。邻桌本地老者瞧得分明，伸手接过我的碗，手腕轻扬，面条高高挑起反复搅匀，铺上脆萝卜丁、酸豆角，撒一把青绿葱花，淋上店里秘制的老卤。拌匀后的面条根根裹满褐亮酱汁，入口筋道弹牙，碱水独有的浑厚碱香齿间舒展。酸豆角冲淡麻酱的醇厚，脆萝卜丁添几分鲜咸，焙炒芝麻独有的鱼香，自舌根缓缓漫开，好似淡墨落在宣纸上，慢慢晕开一层温柔。我低头细细吃完，连碗底余酱都舍不得剩，自那日后，这一碗黑芝麻热干面，便成了心头割舍不下的念想，隔几日不来，心底便空落落的。

店里终日炸着面窝，是本地人吃热干面时的标配。铁勺舀混了黄豆细粉的米浆，撒芝麻葱花下入菜籽油锅，外圈炸得薄脆金黄，内里糕体软润清甜，一口焦脆，一口软糯，恰好和麻酱面的浓郁。每到秋冬微凉时节，吃完拌面总要添一碗蛋酒。土鸡蛋打散，沸水冲起如云絮般软嫩的蛋花，兑上醇厚孝感米酒，甜度温软，熨帖脾胃，一碗入腹，满身寒凉尽数消散。

去得多了，店里一些师傅都记牢了我的口味。煮面火候拿捏得恰到好处，炸面窝会特意多添一把芝麻，蛋酒主动少放冰糖，不必多言半句，经年相处，生出无声的默契。从前待人总带着几分疏离防备，

急切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多大洋？”毛泽东沉思片刻，突然想起前几天刚见过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他对杨至成说：“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我相信，只要有可能，他一定会帮我们。”于是毛泽东写下向徐海东借两千大洋的借条。

杨至成持借条找到徐海东。徐海东看完借条，顿时陷入深深的自责。自从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他虽让经理部为中央几位领导做了几套棉衣、送去几包银耳，却未想到拨出钱款为红军主力解饥寒。如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借条借钱，实在不该！

徐海东立即召来供给部长查国桢，问道：“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

“还剩七千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那好，留下两千，五千块给中央。”徐海东手臂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素有“守财奴”之称的查国桢坐在炕沿上，没有应声。他心中盘算：军团首长既已决定，自己不便反对，可部队眼下正需大笔款项支付伤病员过冬费用。

徐海东明白查国桢的顾虑，语重心长地说：“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都不够用，若拿出五千块，就真拮据了。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开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我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保证他们度过陕北的整个冬天！”

查国桢毕竟是经历长征生死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听了军团长一席话，坚定地点了点头：“我们在陕南时，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都说，哪怕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如今送去几千块钱，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不当‘守财奴’了，我这就去办！”

第二天，供给部派人将五千块大洋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至成喜出望外，连声道：“这下可救了急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将这五千块大洋视为雪中送炭。

此事知者不多，但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多年后，他仍感慨道：“那时候，多亏了那五千块大洋啊！”

从鄂豫皖苏区一路征战到陕北的红二十五军，堪称一支传奇之师：在几支长征队伍中，红二十五军人数最少，平均年龄最年轻，出发最晚，但最先到达陕北。更难得的，在几支主力红军中，他们几乎是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其他主力红军出发时浩浩荡荡，途中牺牲惨重，众多将士倒在征途，而红二十五军一路抗击了敌人三十多个团的围追堵截，不仅没有减员，抵达陕北时反而扩充了八百余人。此外，红二十五军还是长征中唯一一支创建了根据地（豫陕、鄂陕边区十余县）的队伍，也是唯一一支发展地方游击师的红军——他们在商洛地区将各路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十四师，有效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与陕甘苏区的建设。从这支队伍中，走出了近百位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我收回思绪，从六盘山上缓步而下。仰望巍峨大山，我仿佛看见我们的红军先辈，那翻越山峰的坚毅身影，那坚如磐石的钢铁意志，那“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气势，那为中国革命勇于献身的万丈豪情。六盘山啊六盘山，你不仅是一座地理上的高峰，更是长征红军将士意志、豪情与信念的凝聚。你是一座值得我们永远仰望的精神丰碑，巍然屹立历史的长河中，也永远矗立在后来者的心间。

后来才知晓，市井间的善意从无需客套寒暄，这般细碎温柔落在身上，心底满是柔软暖意。

初来武汉，总觉这座城喧嚣扰人，宽阔街道车流不息，本地人说话声调散亮，初听总似争执，早下楼梯买菜，都心无旁骛不安。日日清晨踏足户部巷，在蔡林记守一碗热干面，慢慢读懂喧嚣背后藏着的热忱坦荡。武汉人从不爱婉转客套，舀酱盛面从不吝惜分量，路上见人提着重物，也会主动上前搭把手，所有真诚，皆落在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中。人与一座城的牵绊，从来无关深奥道理，不过一碗适口热面，一份不加修饰的温柔。日子久了，胃安顿下来，漂泊的心，也随之安稳。

前些时日女儿提议，带我去一家精致的网红早茶铺，我婉言推辞。再精巧的摆盘，再别致的景致，都抵不过蔡林记黑芝麻热干面地绵长的风味。我贪恋的不止口中吃食，是店内终年蒸腾不散的热气，是邻座街坊闲话家常、闲谈儿孙琐事的鲜活气息，四方细碎烟火揉作一团，成了我暮年异乡落脚的依靠。随便寻一张老旧木凳落座，捧着一碗滚烫拌面，才算真正融入这座江城。从前总以为归属感是宏大厚重的字眼，如今方才明白，它不过是一碗面递到掌心时，那份刚好动人的温度。

半生偏爱微地清鲜滋味的安徽老翁，终究在户部巷蔡林记，寻到老胃的归处。漂泊迟暮的心，也在巷中年年岁岁不息的烟火里，妥帖落地，再无流离。

施大善与行小惠

刘忠魁

登八达岭长城，脚下砖石历经风雨侵蚀、亿万人步履蹂躏，已然斑驳坑洼。我用手指轻抚砖面——也许工匠也想不到他们亲手烧制的城砖，能供后人登临遥想。岁月流转，筑城者的汗水与尸骨早已融入泥土，他们姓名难寻，湮没尘烟。

游颐和园，昆明湖水澄澈，倒映蓝天白云，佛香阁鎏金宝顶依旧耀目，让人恍然窥见晚清王朝的最后余晖。光绪年间为那场庆寿大礼，挪用海军衙门经费，只为修建一座供太后享乐的御苑，至今压得人透不过气。这笔经费能绘出两张走向迥异的历史图纸：一纸绘出海防图景，图强新生；一纸勾勒楼阁飞檐，讨太后欢喜。

长城到颐和园相距百余里，两处遗址，各自写下两个王朝统治者在历史岔路口上的选择：或于苦难中埋下利泽后世的根基，或在浮华享乐间错失自救的转机。城与园遥遥相望，正所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秦始皇与隋炀帝，千百年间，话本戏曲将二人钉在暴君的耻辱柱上。

嬴政焚书坑儒、大兴徭役，长城之下白骨堆积，无数百姓戍边赴死。生于秦代的民众，无从感知大一统的历史远景，却真切承受着无休止的征役、严苛的律法、骨肉的离散。民众对苛政的切肤之痛，与帝王胸中囊括九州的格局，剧烈冲突，终令大秦江山倾覆。

然而，剥去乱世铁血外衣、抛开君主偏执性情，秦始皇留给后世的是什么？春秋战国数百年诸侯割据，争端无休。及至嬴政横扫六合，终结了王公世族的割据，开统一之先，为华夏筑牢统一的文化脉络；车同轨、广修驰道，畅通地域之间的阻隔；废分封、立郡县，改“家天下”为“官僚治郡”，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可见秦制影响之深。史学家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曾论，抛开嬴政个人功过性情，公元前221年完成大一统，用他的话说，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

隋炀帝亦不遑多让。拨开时空的重重浓雾，他拥有一种远超所处时代的视界——京杭大运河串起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畅通南北水运，将江南富庶物资源源北运，不仅平衡了南北经济格局，也巩固了北方边防。史学家测算，隋大业元年至大业八年，炀帝接连启动22项大型工程，累计调役工3012万人力，耗时近八十年，令全国总人口仅4600万。冰冷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人以血肉脊背扛起的一条川流不息的千年水道。隋唐史学者胡戟先生曾指出，在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型的过程中，隋炀帝与武则天在政治改革上走得最远，但二人在历史上蒙受的污名也最深。隋炀帝行科举取士，更打破豪门世家的权力垄断，寒门子弟可凭学识跻身朝堂，此后千年官吏选拔体系由此建立，是为“利在千秋”。

雄主的宏图，着眼于未来的远景，却置朝廷当下的安稳于不顾，结果二世而亡。根源清晰可寻：几代人的变革重任，本需数十年慢慢消化，却压缩在十余年间尽数推行，变革步伐过猛，施政手段过于刚厉。猛药虽能根治国家沉痾，却无暇安抚当下各阶层，损伤了王朝元气，是为“弊在当代”。秦皇、炀帝是历史苦难的责任者，民众的怨怼，伴随其身前身后。

二

若说秦隋因大改、行事刚猛而二世倾覆，那么王莽新朝与晚清，则无疑展现了另一种失败路径。王莽篡位前善于经营人心，体恤苍生，四处赈灾济贫；身居高位而勤俭自持，礼遇寒门贤士，朝堂之上谦卑恭谨，是当世公认的道德完人。及其当政，却脱离真实社会生产力，食古不化，复古周礼，朝令夕改，频繁更迭币制、官制、田制，农商百业彻底失序。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评其币制改革，认为此举是在大混乱之上再添混乱，农商失业，交易废滞。先前那些脉脉温情的小惠，最终未能阻止国家治理的彻底崩塌。

晚清政权，则将舍大德、逐小惠的短视与懦弱展现到极致。闭关锁国日久，制度僵化，列强坚船

利炮轰开国门，亡国危局近在眼前。彼时真正能救亡图存的大善，是彻底革新体制，可晚清统治者死守皇权与贵族私利，始终不愿触碰制度根本。洋务运动只仿制器物，戊戌变法中途夭折，预备立宪虚伪敷衍，所有变革浅尝辄止。统治者以治标不治本的方式，裱糊着王朝的溃烂。王莽失之于政令过繁、方向混乱，晚清失之于畏首畏尾、变革不彻底。路径虽异，其“逐小惠而失大德”则一也。

藏于史书更深处的争讼，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世人评判历史的尺度。世俗对于善恶的评价，往往轻率地以一事定终身：对一生作恶者，因其一念之善便予宽宥；对一生持守者，因其一事之失便加苛责。于是秦始皇一统九州，奠定国家根基的功绩，抵不过“焚书坑儒”四字刻板标签；隋炀帝开凿运河、开创科举的世祉利好，掩不住时人对其劳民伤财的斥责。

更吊诡的是，世人常从“一事定毁誉”的一端，跳到另一极端：人为剪裁历史人物，以塑造完美。孔子困于陈蔡，饥寒交迫、前路迷茫；诸葛亮连年北伐，暮年有心无力、壮志难酬。后人却剥离他们身上凡人都应有的困顿与缺憾，将其供奉于神坛，反倒失去了对真实人性的理解。

三

千年前诸葛亮治理蜀地，有人劝他多赦罪人，广施小恩以收拢民心，诸葛亮断然回绝，留下传世箴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仅仅九字，道尽行善、治国的辩证要义。

北宋张咏主政蜀地，一名署吏偷盗府库数百铜钱，张咏判其死刑。旁人劝阻：区区数百文，罪不至此。张咏答道：“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世家归正政，不在于广施小恩博取虚名，而在于树立规矩、严明法度。

明代海瑞以一纸《治安疏》谏言君主“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以毕生仕途作赌注，只求推行利国利民의 长久变革。就任应天巡抚期间，强力打压地方豪强，勒令世家归正还侵占百姓的田地。此举虽招致士大夫群体攻讦，却护住了底层百姓赖以生存的土

地。世人常喻两种善举：行大善如同栽树，深植厚土，耐住漫长孤寂。前期少见枝繁叶茂，无人得享绿荫，历经数十载方能长成参天巨木，荫蔽后人。行小惠恰似养花，一朝浇水施肥，不日繁花盛放，即刻收获路人赞叹。可狂风骤雨袭来，繁花转瞬凋零，毫无抵御风雨的根基。人性偏爱即刻可见的绚烂，唾手可得的温暖，鲜有人愿意承担种树辛劳、等候经年生长。

四

黑格尔曾言：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我们总要拥有一批仰望星空、着眼百世之人，方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希望。其中有些人选择大善，总难获得同代人的理解和包容，甚或背负千载骂名，在史书里被涂鸦，但他们在历史的负重中，共同构筑起民族坚韧的脊梁。

然而，我们也须直面另一层追问。恩格斯在阐释黑格尔时曾言：“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以万千血肉作燃料，以一代生民苦难为代价换来的时代前进，究竟算不算真正的进步？若只铭记秦皇一统山河的功业，却抹去长城之下累累白骨；只称颂运河奔流万里的福泽，却无视当年纤夫弯腰跋涉的呻吟——即便以后世的“大德”为名，也不能抹杀前人承受的无尽苦痛。

长城脚下，我曾偶遇一位守山老农。闲谈间问及他对这道城墙的看法，老人磕了磕脑袋杆，缓缓开口：“我祖辈有人修这城墙，活活累死。我自小在墙根下长大，它挡过战乱，也避过风雨。”

这便是寻常百姓面对大善最朴素的心境：不否认功业，亦不遗忘血泪。

时间不会替世人作出选择，只把所有选择的结局静静留在原地。长城砖缝仍嵌着千年前的泥沙，昆明湖底仍沉睡当年彩船的礼炮华。